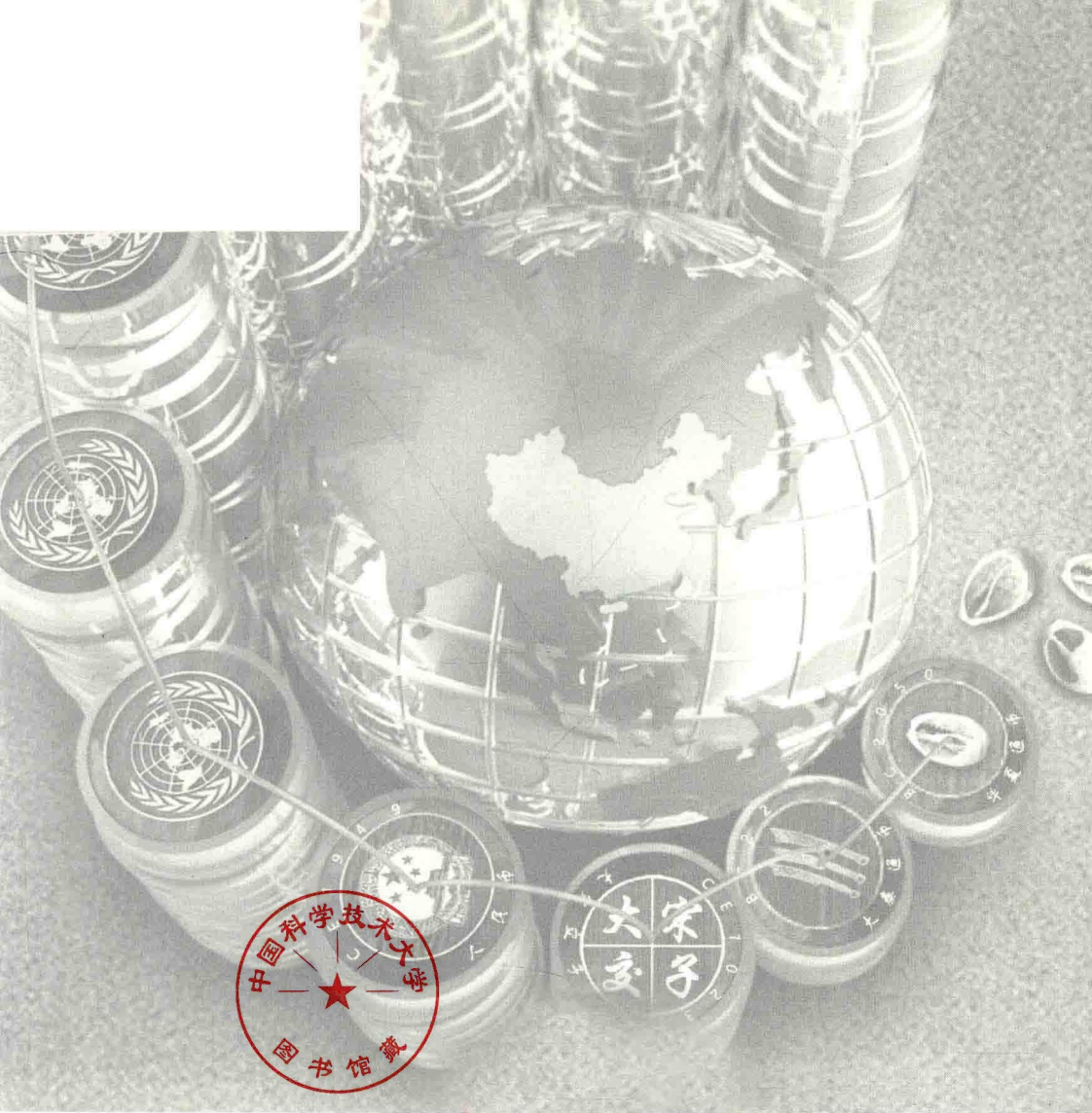




中国的 货币起源

施云江 · 著
范娜



中国的 货币起源

施云江 · 著
范 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货币起源 / 施云江, 范娜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520-2037-3

I. ①中… II. ①施… ②范… III. ①货币史—中国
IV. ①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37978号

中国的货币起源

著 者: 施云江 范 娜

责任编辑: 陈 军

封面设计: 陆艺文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开

印 张: 24.25

插 页: 2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2037-3 / F · 477

定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世界最早货币来自

中国一个叫“奉贤”的地方

献给：

追求理性与效率的人类！

世界最早货贝采自 中国一个叫“奉贤”^①的地方

人类最早使用的货币是海贝，起源于中国，采自奉贤。

中国唯物的理性规定了中国社会文明的走向，并引导了货币的起源。

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禹事件创造了货币起源的现实条件，助推了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完成。4 100 多年前，“典龙”沙冈创新，策动货币起源，并形成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采贝文明”。中国从此开启了信用公共化的大门。它让货币从“计数”起步，也让人类文明选择了一条高效发展的路。但如飞絮游丝般的历史信息如何才能串联起来并形成确实的证据链呢？

^① 奉贤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正式置县。今天已是中国上海市的一个区。

人类最早货币？

德国柏林古钱币博物馆展品所指——中国海贝。

Nr.1 Kaurischnecken, China (德文)

无独有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也同时指向了——中国海贝。

China 2000-1000BC (英文)

图1 德国柏林古钱币博物馆
关于货币起源的世界排名：中国海贝排第一

图2 德国柏林古钱币博物馆
世界最早货币排序展示

11	Vormünzliche Geldformen <i>Money before Coinage</i>
1	Kaurischnecken, China
2	Karneole für Westafrika, Idar-Oberstein
3	Kilindi (=Kissipenny), Eisenstäbe als Zahlungsmittel in den Ländern an der westafrikanischen Küste (Sierra Leone, Liberia, Senegal)
4	Messergeld, China
5	Pfeilbündel, Afrika
6	Gusskuchen (=Blumengeld=), frühes Zahlungsmittel im Norden Thailands und in Birma
7-8	Tampang (=Hutgeld=), Malaysia, Pahang
9-10	Tikal, Thailand, Gold und Silber
11	Teeziegelgeld, Tibet, 20. Jh.



史前考古的“三重证据法”

人类找历史证据，通常是依赖于考古学家的“手铲”。而中国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将考古成果与文献并重的“二重证据法”会有利于考古的突破。但我们看到：去追寻史前史用“两重证据法”依然是不够的。

手铲的尴尬是：或被人先“铲”了（被盗了），或条件不足不敢继续“铲”（如秦皇墓），或大量没有“铲”到的（未发现踪迹的），以及“铲”出后又不知所云，找不到对应关联事件解释的。

文献的尴尬是：古人有以讹传讹的，有编造出错的，有解读时主观扭曲客观的，也有后人无法解读的，以及古人对史前史不明缘由而留白的。尤其对于文字出现以前的事，文献确实也是无法拿准的。

但以史为鉴，又如何才能得到这一客观参考呢？对于史前史的研究，能否从“考古+文献”中引出逻辑，并以此寻求下一个关联证据呢？显然，逻辑会让我们发现更多的历史现象。逻辑推演也必然会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工具。把从人类社会行为逻辑推演发起的第三个角度的“证据”并用，这是本文所依赖的“三重证据法”。

货币面对的两个现实问题和一个延伸问题：

一个效率问题，是针对生产的。生产的效率问题是人类的基础

问题。产业效率组织面对的是需求的引导，而需求是跟从文化的，文化对于产业效率的形成又至关重要。生产效率问题显然不是孤立的。

另一个也还是效率的问题，是针对生活的。生活本无效率可言，但人类生存优化是有效率的。它更是一个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生存优化在现实中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核心的支持也来自人类生产效率的提升。

我们看到：货币是支持效率的，其自身也有一个效率问题。但货币自身的效率更大的力量来自“社会”的赋予，而非货币的实物价值。货币是效率的工具。两个现实问题是属于社会的，而一个延伸问题是属于支持社会的。

人类只需走在生存优化的效率轨道上，文明的延续与规模的扩大是可期的。

人类沿着效率的引导，历经千险终于走到了全球化的轨道上。人类未来也必然地要让货币走在全球公共信用的轨道上，才能实现人类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生存优化。

人类的历史是按照其发展的逻辑走来。当然，我们也可以沿着逻辑的指引去探寻远去的历史。

一个唯物的世界观，养育了一个厚积薄发的民族。

社会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而货币是构建制度的重器。

人类走出非洲，经过了漫长的利用浅表资源的迁徙年代。而人类寻求深层资源是依赖于抽象发现的。人类的生存资源是由表及里被发现利用的。

中国人类祖先，李辉^①等著《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以下简称《Y》书)表示：在2.3万年前～1.4万年前左右，祖先们分三支先后进入中国(为表述方便，我们将此三支祖先分为A、B、C)。根据先到先就近选择资源的原则，我们认为：2.3万年前最早的一支A人群进入了云南并在当地形成了An(n表示若干部落，下同)，即今天的若干少数民族部落群；2万年前另一支B人群沿长江而下形成了Bn部落；最后，1.4万年前一支C人群进入云南后，一路向北，到达黄河及渭河流域，形成了Cn部落。正是这一支人群融合了中国，形成了“汉—北方”与“汉—南方”。

今天来看：中国目前的汉族就是原来各原始部落的合并，占了中国14亿总人口中的91.5%，其余A、B、C三支人群未与汉族融合的55个民族占了8.5%。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人类理性最终会重重地落在社会制度之上。

人类社会文明的核心成果是社会制度。合理的制度必须具有三个要素：理性+效率+货币。理性代表公平，效率代表成果，货币代表分配。中国社会文明史，放眼望去，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理性和四次转型。

一个理性：因为唯物，所以没有被迥然不同的文明所淹没。中国历史上唯物世界观的起源，可以上寻至6800年前母系社会女娲族的

^①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目前我国唯一从事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李辉作为实验室中的教授兼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第一位人类生物学博士和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博士后。他兼任了多家国际权威杂志的编辑等工作，发表过大量论文；其主攻东亚人群起源和进化方向，并于2015年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一书。本书获“上海科技专著出版资金”资助。

“巫”文化。以后力量更强的伏羲父系部落崛起，并以母系的“巫”文化为基础创新了双鱼八卦图，进一步对唯物理性的表述，引导并规定了中国社会文明的形成和走向。

四次转型：中国社会四次大转型是指汉民族文明而言。第一次是C内部在6 800年前发生的母系向父系的转型。第二次是C+B在4 100年前南北融合后，部落制向国家形态的转型。第三次是在2 200年前氏族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型并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汉。第四次是1911年以来封建制向民主制的转型。中国社会制度文明的转型大致是2000年左右发生一次。

从汉民族“母系向父系”、“部落向国家”、“分封向郡县”、“封建向民主”的社会大转型来看：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其历史上第四次大转型后的起点处。

序 言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原院长 朱晓明博士

现时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与古时的中国货币起源之地，这两个不同时间坐标上的事物，居然在空间坐标上重合了——重合在上海。《奉贤与货币起源》一书将此告诉了生活在上海的人们，也告诉了正在了解上海的人们。我作为一个生于上海长在上海的人，之前并无所知，直到2015年1月作者邀请我为这本书写序言时，经通读书稿后我才知晓的。据我所知，作者施云江早些年就开始了奉贤地缘的“采贝文明”与中国金融的变迁史实做了开题研究，而在2015年1月他的专著《奉贤与货币起源》出版之后的两年中，施云江并未停止这个课题的进一步的深入考证与研究，这个新的研究成果就是您手中的这本书《中国的货币起源》。

在这两年中，作者（施云江、范娜，下同）用各种方式先后向多达1500个博物馆（大到国家博物馆，小到地方县级博物馆）征询有关贝币的考古研究成果，拓展求证视野；又驾车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从北到南跑了好几遍，收集到了各地众多种类的贝壳。把这些来自各地的贝壳与采自于奉贤当地的贝壳，逐一跟国家博物馆提供的贝币进行比对，研究表明，只有奉贤的与国家博物馆的才最相似。这加强了作者这二本专著主要观点的论证。

在这两年中，作者曾驾车前往四川三星堆，去考察该遗址出土的

大量海贝。此后，作者又先后两次分别前往甘肃天水和河北涉县，去考察伏羲八卦产生的缘由，考察女娲部落的史料。作者认为：这些看似玄妙难懂的历史遗迹，透露出了唯物理性支持下的坚韧不催的部落文明及其理性。作者指出，货币起源的研究与这种唯物的包容与创新的理性相关。

作者曾多次赴欧美，考察了众多有国际影响的展馆，研究它们对中国贝币历史贡献的认可度。作者发现大英博物馆把中国贝币实物布展在人类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货币之列，并旁注了“China 2000~1000BC”；也发现在德国柏林古钱币博物馆展出的全球货币起源的排名中，中国贝币名列其首。

显然，作者对贝币及中国货币的发源地这一命题所开展的历时的、详之又详的调研分析，是肩负企业社会责任的自觉作为。施云江是一个非金融界的企业家，但他的跨界、跨领域的探索精神，值得学者、金融家、企业家共同钦佩。今天，任何一门学问与专业都在开展跨界、跨领域、跨年代的合作研究。比如，本书作者施云江将金融学研究追溯到中国货币的起源，而电商企业将金融学研究前瞻到区块链（分布式账本），不过，他们都不弃离信用这根主线。比如，一部分学者将人工智能的研究追溯到远古时代自然环境变化对人类迁徙、人脑进化的影响，而当下的企业巨子将人工智能研究前瞻到深度学习、认知计算，不过，他们都不弃离人脑科学、神经网络这条主线。

从传统的工业经济跨越到今天的数字经济，人类仅用了短短的25年时间（全球公认：1992年是世界互联网元年）。25年来，商业世界巨变，经济、社会、文化、教学等也发生了巨变。在期待未来、拥抱未来中，企业家们的跨界创新精神，弥足珍贵。施云江曾在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等高等学府学习、深造。在中欧，我耳闻教授、同班同学对他在学期间的刻苦研读给予好评和赞誉。他才思敏捷却又谋略沉稳；他精于本业却又触类旁通；他经营有道却又强学博问。创新让他充满活力。

我们有幸处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好时代。这个时代，人才辈出；这个时代，有望人尽其才。我为施云江这样的既出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又出好的研究成果的企业家点赞。拥有这样一位学者型企业家，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荣幸；而为这本书写序言，是我的荣幸。

* 作者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前 言

中文字“币”，原为“幣”，帛也，意为古人作为礼物的小块丝巾。在中上加一横，成了币，意为特殊丝帛。也就是说，当中国货币起源时，就把它与当时最为珍贵的丝巾联系在一起了。什么货最贵呢？当然是“币”的货最贵。

说，货币起源，应先问：货币是什么？有说，是万物的等价物，那么它依然是物或商品。而本书说的货币是万物的“信用等价物”，是一种社会赋予了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也是一种真正脱离了商品的“商品”。

其次要问，货币的“起源”要具备哪些条件？

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韩汉君认为：货币的“起源”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是货币最早的实物及实物供应地；第二，是货币发明人及所在地；第三，是货币最早的使用地。

在这一观点下，我们认为，货币起源还应满足另外四个条件：一是起源的时间须国际公认最早；二是公认的该货币是大范围使用；三是该货币要长时间使用；四是最早起源的货币应该具有社会赋予价值的一般等价物的特征。因为，物物交换的类货币起源事实上是

无从查起的。

根据上述7条，货币，核心条件只有一条，即：具有“社会”赋予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才是真正的货币。那么，谁是“社会”？“社会”在哪？

今天我们所述的从中国起源的货币能否满足上述条件呢？从中国起源的货币最终是一个什么性质和特征的货币呢？海贝当作货币是中国最早吗？起于何时？何人发明？连续使用的时间有多长？最终使用的范围有多大呢？社会赋予这种货币的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上述问题的提出，以及从两个奉贤历史故事——“三女逃亡”和“子游讲学”的推论中，我们看到了建立货币起源的研究框架。

有了货币起源的研究框架，我们发现货币是社会的，社会是理性的，而理性又是无国界的。那货币起源的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展开呢？

社会是由人类组成的。从今天来看：人类起源的痕迹，也许可追寻至300—500万年前。在中国也曾发现数十万年、甚至有180万年前的人类活动。人类在这漫长的进化史中，无数次的迁徙和生存竞争究竟为了追寻什么？

根据犹太《圣经·创世纪》记载，犹太先人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承诺：“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在这不过百字的文中，反复出现了两次“多国的父”和“后裔极其繁多”，可见人类借“神力”来得到“人力”并对民族规模壮大的愿望自古就有，而且是迫切的。

对考古的研究，王国维大师提出“二重证据法”已是一个大突破。但史前的历史现象，在既没有考古成果也没有文献证据关联或独立结论的条件下，推理则成为能用的重要工具。因此，本文在研究中是采用了“三重证据法”，即考古+文献+推理=观点。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些联系是依据其内在逻辑而存在的。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随着上述两个故事的推演和展开，我们居然看到原本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对“2 500年前百家争鸣的理性与3 600年前起源的甲骨文”关系上形成的对“更远历史”追索的屏障，现在可以通过逻辑有机会越过“理性与文字”表述的断裂或脱节，将考古依据及文字史料不足的更遥远的理性及历史现象与今天加以连接起来。历史凭借其逻辑的连贯性可以穿过2 500年前百家争鸣理论体系形成的时间，跨过非文字区域的历史，一直延伸到中国母系时出现的唯物理性或更远的生物选择上去。其中货币起源的因素关联成了这个穿越的跳板。我们感到：研究货币起源的同时也拉近了中国源头理性与今天的关联，并看到了其理性中更现实的普世价值。

关于本文的研究：

本文最初受命于：上海市民营经济研究会（又称：民研会）希望研究的一个沿着“产业从需求”、“需求从文化”、“文化推产业”的逻辑追寻的课题。

研究发现，货币关联的确实不单单是一个产业问题，而是一个人类共同关注的生存优化的效率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

今天，我们把原书名从论说证据为主的《奉贤与货币起源》更名为现在以厘清货币关系为主的《中国的货币起源》来回答上述一串更宽的问题。

一个隐隐约约的历史身影在一个神奇的逻辑牵引下渐渐浮现。

与以往考古学家用“手铲”来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本书是发端于一个现成的奉贤故事，并在推演中看到更远的历史印象。接着也是依据现成史料的指引走向判断。在逻辑与证据之间我们是不断寻求各方的互为帮衬与支撑，从而形成了不断向前探索的机会与力量。

中国货币在一个远离中原的荒凉之地起源了。这个“身影”的出现，从一开始就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当我们沿着“三女逃亡”的逻辑指引，上寻至4 100多年前的历史界面上时，远古历史上碎片式的证据竟然像是摆放在海滩上的海贝，一路走去一路呈现。结果，我们似乎感觉到：人类货币起源这一页离奇的历史要在奉贤翻开了。

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当时中原所用“贝币”采自奉贤的历史影像，一时真不知正确的稽考应该从何处入手。史料的真相确实不是一眼能够看透的。但沿着历史的逻辑，在对史料不断地发问、层层推进后，我们发现了更多的历史关联。这就像是在黑夜里小心地摸着道行走。意外的是：围绕着沙冈一阵忙活下来，似乎在黑夜的每一条通道里，都洞现出一些耐人寻味的历史影像。

更让人欲罢不能的是：在中国源头理性的投影下，我们看到了一个4 000多年前中国货币起源的图像与人类未来货币机制再形成的图影，其理性在逻辑上的一致着实又让我们倍感震惊。

当“三女逃亡”揭示的历史缘由还在探寻的路上时，我们却从德国柏林古钱币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带来了“人类货币起源于中国海贝”的结论。同时，我们还看到：中国货币史专家萧清与历史地理学